

麦金农经济学文集

第五卷

中国金融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麦金农经济学文集

第五卷

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

Dollar and Yen: Resolving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美〕罗纳德·I.麦金农　〔日〕大野健一　著
王　信　曹　莉　译
陈雨露　校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仲　垣
责任校对：潘　洁
责任印制：裴　刚

© 1997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is translation of Dollar and Yen: Resolving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7,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MIT Press.
北京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5 - 4316
《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中国金融出版社所有，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美）麦金农（McKinnon, R. I.），（日）大野健一著；王信，曹莉译，陈雨露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0
（麦金农经济学文集；5）
书名原文：Dollar and Yen: Resolving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SBN 7 - 5049 - 4168 - 9

Ⅰ. 美…　Ⅱ. ①麦…②大…③王…　Ⅲ. ①美元—研究②日元—研究③国际经济关系：日美关系—研究　Ⅳ. ①F827.121②F823.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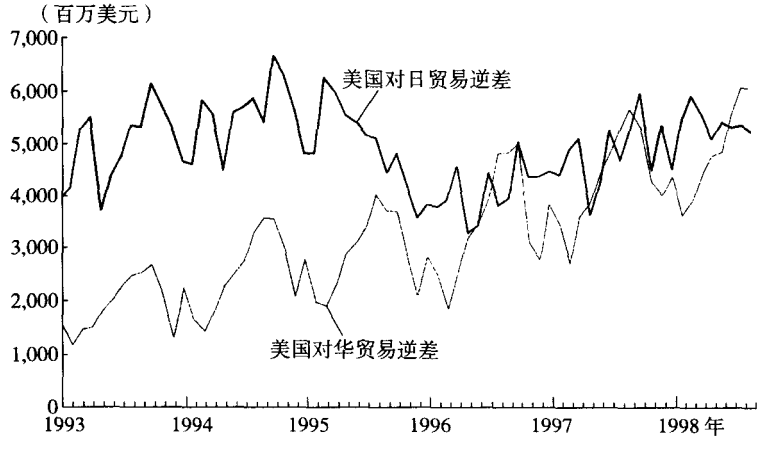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300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72190，66070804（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63365686（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55 毫米 ×235 毫米
印张　13.5
字数　242 千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精装　1—3000　　平装　1—2000
定价　精装　320.00 元（1 ~ 6 卷）平装　280.00 元（1 ~ 6 卷）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中文版序言

日本当前的经济困境及其历史上与美国的关系，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美国处于国际美元本位制的中心，它对其他国家的汇率和外贸政策能够发挥超乎寻常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对美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可能会激怒美国施加压力，抬高该国货币，使之陷入通货紧缩的境地。从7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贸易压力主要是冲着日本，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当前经济滑坡，这正是本书的主题。

但在9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迅速增加，与日本对美国的顺差相仿。诚然，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比日本的顺差还少得多。但是在几个不同场合，一些美国官员已经把中国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与“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联系在一起，即中国国内经济的自由化还不够。本书的读者将发现，这些抱怨与60年代末以来对日本的批评何其相似。



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

70年代初以来，美国非常关注日本迅速膨胀的贸易顺差，两国间出现

大量的贸易争端，促使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历时很长而且不稳定，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71年8月的360日元升至1995年4月的80日元，导致本书所说的“日元升值综合征”。从70年代末开始，日元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使日本的利率大约比美国同类利率低4个百分点。

尽管高估的日元已从1995年的最高点有所回落，但1998年下半年日本的贸易顺差又急剧膨胀。因此金融市场普遍担心美国会故伎重演，施加贸易压力抬高日元，这从日本的名义利率仍比美国同类利率低大约4个百分点可见一斑。此外，90年代下半期，美国利率已降至较适中的4%～5%；根据开放式利率平价原则，国际套利行为迫使日本的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流动性陷阱便产生了。

整个90年代，日元升值预期及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抑制了日本的私人投资和消费。由于利率水平过低，日本银行无法有效地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重振经济。此外，1997年危机爆发以前，日本的低利率导致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亚洲危机国家出现过度借贷的现象。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与1997年以前的亚洲邻国明显不同，并未借入大量的短期外债。虽然中国允许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欢迎外资进入开办合资企业，但仍保持对资本项目的控制。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下滑，东亚国家的经济也很不景气，中国的增长有所放慢。这促使中国总理朱□基在1998年宣布一项3年期反周期的财政扩张计划，总投资接近1万亿美元，以防止经济陷入停滞。这是必要的，但不无风险。

显然，日本经济依然问题重重，这使中国的事情难度增加。因而中国读者对理解日本式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天然就有浓厚的兴趣。本书阐述了我们关于日本由汇率引发的通货紧缩的理论，我们希望能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但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由于中国经济及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都持续增长，美国同样会对中国施加贸易压力。早在25世纪以前，美国就开始这样对付日本，导致日本陷入了当前的通货紧缩。令人担忧的是，历史可能重演。

无论如何，弄清问题的历史根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聪明的中国读者将会意识到，中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内商业的自由化，同时赢得了保持人民币对美元长期稳定的声誉，便可以把美国的压力减少到最低限度。中国政府从1994年开始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固定在接近8.3:1的水平，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一旦中美两国政府和市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一基准汇率，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么即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上升，美国的决策者也难以要求人民币升值。

我们要感谢所有参与本书翻译工作的中国朋友，尤其是组织者肖梦女士、译者王信先生和曹莉小姐。多年来，钱颖一先生对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市场化进程作了特别深刻的剖析，我们从中获益良多；正是由于他始终不懈的热心努力，本书才可能翻译面世。

罗纳德·I. 麦金农　大野健一

1998 年 12 月

序　言

是否还存在另一种理论，能更合理地解释美日两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作用？三十多年来，美国不断批评日本的产业和汇率政策，而日本则对美国少得可怜的储蓄行为、多如牛毛的诉讼颇不以为然。凡此种种早已普通至极，司空见惯。然而有时候，即使一方对另一方的指责过于偏激，也包含真理的萌芽。

这本书对如何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提出什么看法呢？由于一位作者在美国大学执教，另一位在日本大学授业，彼此合作，便能更好地判断——进而接受——两个国家中哪些批评是合理的。另外，作为学者，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否定、或者干脆不理会那些偏执怪诞、有时具有破坏性的臆想；有关这些内容的报刊，无论英文版还是日文版，在机场报摊上都极为畅销。

更有意义的是，我们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解释商业争端如何影响各自国家的金融活动和经济周期，为有关讨论注入了新内容。通常，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日元兑美元汇率及其将来变动的预期上。理论验证需要大量的实证分析，其中有的要经得起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因此，虽然不能保证通篇明白易读，但我们确实要提出一套系统的思路，旨在化解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并改善其宏观经济状况。

那就是说，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技术性并不很强，其中包括表述主要观点的第一、十和十一章。因此，本书适合于那些对美国、日本以及更一般的内容——国际经济学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即使有些章节出现方程式，对国际金融专业的师生来说，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要感谢各自的妻子，玛格丽特和泉，她们默默忍受共同写作常要进行的漫长的跨洋旅行；玛格丽特·麦金农对几章的编辑工作特别有帮助。我们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荻本（Daniel Okimoto）教授，他不断给我们以热情洋溢的鼓励和宝贵的资金支持。

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或彼此的观点出现碰撞融合，我们常要改写有关章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特里·沃恩（Terry Vaughn）、

维多利亚·里查特松（Victoria Richardson）和桑德拉·明基宁（Sandra Minkkinen），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宽容和谅解。《日本经济新闻》同样那么富有耐心，在它的赞助下，本书的日文版也即将出版。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日元升值综合征…… 1
第二章　美日经济冲突的政策原因和战后根源：生产率增长差异及美国储蓄短缺 …… 17
第三章　汇率波动及其后果：价格差异和日元升值引发的衰退 …… 43
第四章　平衡较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工资调整与日元升值 …… 62
第五章　转移问题和宏观经济波动：日元升值引发的衰退、泡沫和信贷危机 …… 78
第六章　汇率和贸易平衡的理论：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 102
第七章　现实汇率和日美贸易余额：对现代弹性方法的批评…… 117
第八章　货币和汇率制度、持续的通货膨胀和长期利率波动…… 134
第九章　通货紧缩和购买力平价：对日元升值和日本货币政策的因果关系分析…… 146
第十章　治愈日元升值综合征：建立美日商业协作和货币协调机制…… 169
第十一章　日元升值综合征消失了吗？1995～1996年日元贬值及其对转轨的启示…… 183
参考文献…… 194
后记…… 204

第一章　导言：日元升值综合征

关于美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作用，永远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日本从战争废墟中站了起来；从此，直到整个 80 年代，其经济扩张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取代了美国在世界制造业市场的霸主地位——首先是纺织、消费品等轻工业，然后是诸多需要一流工程技能的领域，如汽车、电机等。即使在 1992 ~ 1995 年，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是日元升值综合征的部分特征，本章将加以解释），日本高科技工业产品的贸易顺差仍强劲增长。

大量书籍、杂志和新闻报道都试图找到日本贸易成功的原因——并判断这是否将威胁美国特定产业，抑或影响到整个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作者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等情况，与日本的“不公平”做法联系在一起，他们指责日本利用工业、商业、汇率及国内金融等手段，阻止各类外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美日两国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按照逐个产业回顾国际贸易的发展变迁。日本出现工业生产率与出口相对高增长等“问题”以后，两国的工资、物价总水平、利率如何相互进行调整？五六十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固定时，这些变量的调整与 1973 年开始实行无平价的浮动汇率制后的调整有否显著区别？为了寻求一些答案，我们考察了以下方面：美国储蓄短缺；80 年代初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以及在过去 20 年日本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同时，我们还探讨了 1985 年开始出现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其中包括 80 年代末日本的资产泡沫，1991 ~ 1992 年美国的信用紧缩，以及 1992 ~ 1995 年日本严重的通货紧缩。

但这些内容似乎过于庞杂。我们需要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使分析能够有的放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平价制度下，从 1949 ~ 1971 年初，日元一直平稳地保持在 1 美元兑 360 日元（增减 1%）的水平。自此直到 1995 年中，日元对美元不断攀升，时有波动（图 1.1）。到 1997 年初，1 美元甚至只能兑换 120 日元。本书第一个突出特征是，将日元兑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劲升与美国的贸易压力联系起来，之所以产生这种压力，是因为两国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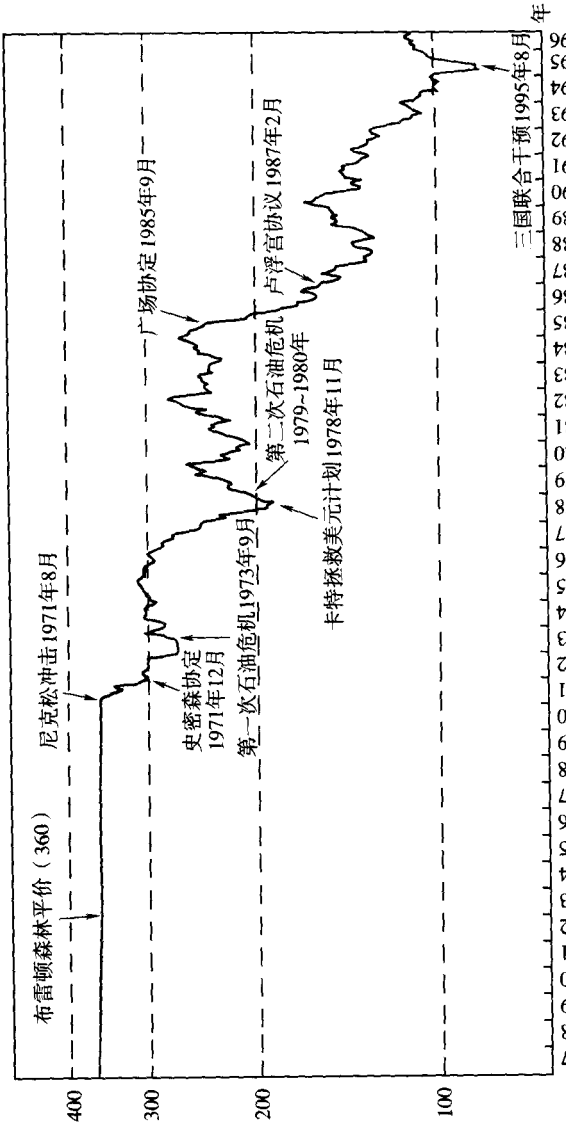


图1.1 日元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半对数标度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CD-ROM，December 199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发商业争端，贸易关系紧张。相应地，1995 年中至 1997 年初，日元贬值与美国放松贸易压力密切相关。第十一章将分析这一重大事件。

经济学家的传统做法是，将国际金融研究（即研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汇率决定有何影响）与贸易流动、商业政策及贸易争端的研究相分离。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在大多数时候适用于大多数国家。然而，我们认为传统的二分法无助于理解 1971 年以来美日宏观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至少到 1995 年 4 月，商业冲突，时不时还以贸易战相威胁，是推动日元升值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当 1995 年夏天警报解除时，日元便贬值了。

我们的研究方法中第二个异乎寻常的方面是，将日元汇率的变化视作决定日本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而过去认为货币政策独立地决定汇率水平。这一点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分突出，当时日本银行因为必须维持日元兑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将其国内信贷扩张政策置于从属地位（Suzuki，1986）[1]。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70 年代日本银行收紧银根，实在是受到日元升值的制约，第七章、第九章将对此进行计量分析。反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自主决定通货膨胀水平。

本书的许多分析都贯穿着两个重要的、但尚未为人所知的因果关系链条，即从贸易压力到日元汇率，再从汇率到日本货币政策。

大多数研究汇率及国际收支调整、并著书立说的学者（如 Bergsten，Cline，1985；Krugman，1991；Williamson and Henning，1994）都把名义汇率视为调整变量而不是决定变量。自主的货币（及财政）政策造成了各国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异，汇率应据此进行调整。此外，这些作者认为，大幅度调整实际汇率可有效地调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也就是说，能确保资本从 A 国净流入 B 国。因此，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固定的名义汇率上去。

在许多重要情形下，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理论是有效的，对那些软通货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依靠通货膨胀税来增加收入，必须让货币继续贬值下去。传统理论也适用于未遭受长期通货膨胀之苦但经济十分封闭（指贸易及资本流动未能与外部世界完全融合）的国家。第六章指出，汇率调整有助于管理国际收支。

但我们相信，对那些商品和资本流动向国际市场高度开放的硬通货国家来说，名义汇率的不断变动是有害的，这说明各国的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上，汇率波动会干扰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投资效率

1　外文为作者名，年份为其著作出版年代，具体书名参见本书所附参考书目。——译者注

(第三章)。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两个紧密相联的经济体之间名义汇率的波动不利于两国相对工资增长、利率及价格水平的长期平稳调整（第四章)。1970 年后的 25 年间，日元震荡上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中期看，汇率高估可以引起严重的经济衰退（第三章和第五章)。如果未来汇率不确定，那么资本更不容易从一国平稳流到另一国（第七章和第八章)。尽管本书作者之一麦金农（McKinnon）1996 年出版的姐妹篇对这些问题作过更全面的研究，但当前对日本和美国的案例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经验证据，说明相对货币价值变动的代价会何等高昂。

1.1 商业争端的来龙去脉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汇率开始脱离平价自由浮动以来，美日两国的商业争端是决定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核心要素。由于它影响两国政府的行为，因而理解争端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就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美日之间的商业冲突会比其他工业国家更严重呢?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来，日本制造业平均生产率及产出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第二章)，两国出现严重的商业冲突。日本的增长很不平衡：电机、汽车及家用电器制造业膨胀十分迅速，远远超过其他产业。整个日本经济（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增长：1964 年日本出口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 1/4 左右，但到了 1995 年，已大大超过 3/4。因此，无论国际金融体制运行多么平稳，无论两国外交官为政治和谐如何不辞辛劳，两国之间仍不免存在严重的经济调整问题。

但两国政治经济的一些不良趋势也使经济调整复杂化了，第二章对此有所涉及。就日本而言，政府过久地依赖“集权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参见第二章的定义)，或简单地说是“开发主义”（Murakami，1992）来推动工业部门的发展——其力度已远远超过使经济从战后废墟中复苏可能需要的程度。几十年来，政府有意识地扶持几个大产业发展，帮助它们获得国际竞争力，但目标未完全选准，难以尽如人愿。为了防止政策倾斜过度扭曲国内收入分配，政府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管理机制，扶持或保护许多“劣势”产业——通常是制造业部门以外的产业，使它们免于遭遇国际、国内的激烈竞争。

由于日本多个官僚机构联手对市场进行管制——这股势力往往通过日本工商企业组成的贸易联合会起作用，因而给试图打入日本市场的外国人设置了可怕的障碍，而且还可能保护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串通一气的行为。因

此，越来越多的作者认为日本进行了“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1996年任克林顿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劳尔·泰森（Laura Tyson）出版的一本书，名为《谁冲撞谁？高科技产业的贸易冲突》（*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1992）。该书用数个章节描述了美国半导体、移动电话、超高速计算机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企业，在打入日本市场时所遭遇的极为苛刻的监管阻挠，以及冲突可能引起的紧张的政治对抗。之后泰森总结道：“美日之间贸易竞争的案例……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说明，日本市场一直存在着结构性及政策性障碍。虽然日本主要在美国的压力下逐步解除堂而皇之的保护，但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仍不利于外国供应商与占据天时地利的日本对手进行竞争。”（p. 266）在一本更全面地研究日本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的书，《差异能否弥合？——关于美日经济冲突》（*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United States - Japan Economic Conflict*）（1993）中，C. 费尔德·伯格斯顿（C. Fred Bergsten）和马库斯·诺兰（Marcus Noland）得出结论：

> 除农业以外，日本不存在明显的高关税及配额限制。但是，世人皆知日本制造业产品市场实际上是严格封闭着的。进口管制的方法有：关联公司（Keiretsu）的网络是排外的；政府官员对进口中间商进行行政指导；滥用海关程序、产品标准、检测及合格证的发放程序来限制进口；没有对专利权及商标权的严格保护；政府采购偏袒国内供应商；限制进口产品的销售渠道等等。仅列举几例就足够了。（p. 72）

机场报刊亭充斥的各种消遣性读物，绘声绘色地描述日本公司如何在国际贸易中串通一气，试图削弱美国经济。虽然日本已经放宽许多更为苛刻的限制，允许更多外国企业在其市场上销售商品——如设立大型让利零售店（OECD，1995），但在积极卷入贸易冲突的外国人脑海中总残留着这样一种印象，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太过分了。

对美国来说，同样残留着过去年代的有害物，贾迪什·巴哈格瓦提（Jagdish Bhagwati，1993）称之为“巨人萎缩综合征”（the diminished giant syndrome）。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方面一统世界高科技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又是自由世界抵制共产主义发展的坚固堡垒。随着1947年关税总协定、1948年马歇尔计划及1949年道奇（Dodge）计划的启动，美国摆脱了国内目光短浅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利益，促成以市场开放、经济自由为原则的国际多边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为了鼓动欧洲各国及日本共襄盛举，美国在50年代愿意承受西欧国家对美国商品实行的过渡性贸易歧视，以鼓励这

些国家相互进口产品；同时，允许日本实行（过渡性）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时间之长，令人惊异。例如，直到1964年，日本才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的第八条款义务，到80年代初才差不多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

但是，正是这项伟大事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巨人萎缩综合征”。因为当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技术水平足以和美国相媲美时，美国精密制成品市场份额的下降已经无可挽回。这与19世纪末的英国何其相似。

英国在世界经济中风光不再，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结束英国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呼声渐高。现在美国也步其后尘。与19世纪英国的情形相似，今天美国主要把气出在新近崛起的对手身上。当年英国的对手是美国和德国，现在美国则主要针对环太平洋国家，日本更是首当其冲。（Bhagwati，1989，pp. 48-49）

尽管美国不像英国那样受到军事威胁，但巨人萎缩综合征暴露得更加明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金融市场实际上已经开放了，美国储蓄率下降使其出口相对下滑的局面更趋恶化（第二章）。美国不得不引进世界各地资金，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和贸易项目都出现巨额逆差，美国在各类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加速下降。

美国很早就开始关注来自迅速强盛起来的政治盟国的贸易压力。早在1956年初，美国政府就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对进入美国市场的棉纺织品实行“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2]1966年，美国又劝说欧洲国家及日本对出口美国的钢材实施“自愿出口限制”，1970年该限制扩大到特种钢材。1968年，美国电视制造商针对日本制造商提出反倾销诉讼，1971年美国政府向进口的日本电视机课以沉重的反倾销关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会提出许多全面保护制造业企业的严厉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最终流产，但还是给政府施加了压力，敦促政府“有所行动”，拯助美国制造业（Robert Baldwin，1988）。

只要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平价保持稳定，并且美国经常项目出现顺差，如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时期的情况那样（第七章），美元汇率就不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这是支撑汇率平价的重要力量之一。但

2 早些时候，美日双方曾通过谈判达成棉制品出口限制。以此为铺垫，1961年各国签订约束力更强的“国际多纤维纺织品协议”。所有工业国家（现在也包括日本！）共同限制进口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但1994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该协议在十年内将逐渐失效。

是，1968 年以后，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批发物价相对于德国和日本不断攀升，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强（第四章）。1971 年 8 月，尼克松总统坚持要求美元对其他主要工业国货币贬值。同年 12 月，美元对日元贬值约 17%。尽管当时人们还未充分理解，但该行动实际上已说明美国不再承诺稳定汇率平价。

但是，美元一次性贬值不能缓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政府对进口钢材实行“触发价格”（trigger prices'）。此举与“自愿出口限制”到期后，美国钢铁公司提出的大量反倾销诉讼紧密相联。这些诉讼针对所有外国钢铁制造商，尤其是日本制造商，前后贯穿整个 80 年代，并延续到 90 年代。随着日本工业产品日益复杂化，在贸易领域，美国政府的目光越来越集中在日本身上。日本对出口美国市场的自愿限制激增，70 年代开始影响电视机产业，70 年代至 80 年代波及机械工具，80 年代轮到汽车。美国商业部的一系列做法，使美国公司越来越容易证实其针对外国企业，特别是货币升值国家[3]（如日本）企业的倾销指控是成立的（Krueger，1995）。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各国政府为缓解对美贸易压力进行协商，结果“自愿”实行专门的出口限制。这明显违背关贸总协定的宗旨，但却没有与其中任何一项具体条款相冲突。同样，民间的反倾销诉讼可能会与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相一致。但是，美国商业部评估外国商品在美售价的程序过于繁杂，反倾销诉讼（无论输赢与否）给外国公司造成难以置信的账面损失，以及判定美国制造商遭受损失的标准一降再降，这些都与关贸总协定的精神不相符（Krueger，1995）。

但到了 80 年代末，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对美国经济与军事不再构成威胁，美国总统更难以压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国会有势力强大的代言人。到 1988 年，美国越来越飞扬跋扈，自行其是，把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现在人们通称的“超级 301 条款”在贸易法中固定下来。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悲剧》（*American Trade Policy: A Tragedy in the Making*）（1995）一书中指出：

1988 年的《贸易与竞争综合法》将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纳入其中，从而大大扩展了所谓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范围；使之远远超越了关贸总

3　可以先看两国相同产成品目录中任一种商品的价格。如果出口国货币突然升值，即使目录价格不变，也可能受到“倾销”指控。实际上，商品价格不能随着汇率波动灵活进行调整。

协定的原则。特别是，国会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将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做法记录在案……每年5月末要向国会递交有关报告……1988年的贸易法还授权美国贸易代表，一旦未能通过谈判要求相关国家改变受到指控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可以对这些国家的进口进行报复。(p. 64)

301条款为美国贸易代表扫清了道路，他们可以单方面要求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向美国商品开放本国市场，而美国无需提供互惠待遇。一个结果是通过所谓的“自愿扩大进口”(voluntary import expansions)，详细规定了美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中所占的份额。1986年就头一项“自愿扩大进口”协定展开谈判，以确保外国生产的半导体（据认为主要是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占20%的份额；协定还有附加条款，要求日本保持足够高的价格，以保证美国制造商在国内及第三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许多反指控，之后谈判的议题是日本是否违反上述附加条款（Itoh, 1994）。

克鲁格注意到，1990年超级301条款到期时，布什政府并没有加以延续。但她同时指出：

到1994年冬，在克林顿政府“数量指标”的压力下，美日双边贸易关系又趋恶化。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以行政命令形式重新启用超级301条款。他坚持认为，对日双边贸易平衡状况以至日本进口的具体项目数量都应该进行双边谈判。他扬言，如果日本不认真纠正导致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无法使美国满意，美国将施以报复（很可能是惩罚性关税）。(p. 67)

1995年头4个月，以美国重新启用超级301条款为基础，美日两国就日本向美国企业开放汽车及零部件市场问题展开艰苦卓绝的谈判。整个过程扣人心弦。其间，美国谈判代表威胁，将不经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可，对日本出口的豪华小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同时，外汇市场上日元急剧升值。最后，1995年6月，两国政府终于勉强达成协议，要求日本增加美国汽车及零部件的进口（第十一章将解释美放松对日商业压力如何影响汇率变动）。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在1994年宣告结束，随后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但美日两国商业政策上的紧张关系早已根深蒂固，可能还会长期持续下去。那么，它对金融已经造成、还将继续造成什么影响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